

# 劍橋中國史

第十一冊

晚清篇(下)

1800—1911



# 劍橋中國史

第十一冊

晚清篇 1800—1911 (下)

John K. Fairbank · 劉廣京編

張玉法主譯

李國祁總校訂

臺北南天書局發行

PDG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General editors*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This 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0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der the titl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It is translated by arrangement.



劍橋中國史 11 晚清篇 1800—1911 (下)

平裝新台幣450元  
精裝新台幣560元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初版發行

總校訂者：李 國 祁  
主譯者：張 玉 法  
發行者：魏 德 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1號3樓之2  
☎(02)392-0190 郵政劃撥：01080538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中文國際版  
翻印必究

鉛排廠：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928-7145 台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印刷廠：志龍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309-2375 台北市武成街1號

鼎  
龍  
知  
PDG

## 第十一冊譯校小組名錄

篇名	譯者	校閱者	篇名	譯者	校閱者
第十一冊序言	余敏玲	張玉法	第七章	簡桂琴	張朋園
第一章	張遵倩	王樹槐	第八章	江淑玲	李定一
第二章	翁佳音	李恩涵	第九章	陳昭璇	蘇雲卓
第三章	吳文星	郝延平	第十章	余敏玲	張玉法
第四章	吳映華	劉廣京	建議 閱讀 書目	張瑞德	張玉法
第五章	吳怡聰 林桶法	張灝	參考 書目	杜繼平	張玉法
第六章	安嘉芬	林明德			

## 主編者序言

在英語世界裏，從本世紀開始，劍橋史已經為大部頭的歷史著作立下了典範。每章專題都由專家撰寫，而由資深的編輯加以統一整理。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籌劃的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共十六冊，於 1902 年至 1912 年陸續出版。其後又有劍橋上古史、劍橋中古史、劍橋英國文學史、劍橋印度史、劍橋波蘭史、劍橋大英帝國史。最初的劍橋近代史現在已為 2 冊的新劍橋近代史所取代；劍橋歐洲經濟史也即將完成。最近編纂的包括教史、阿拉伯文學史、聖經史（影響西方文明的重要文獻）、伊朗和中國史。

就中國史而言，西方史家面臨一個特殊的問題。中國文明史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史還要複雜，並且也比整個歐洲文明史的分歧要小。中國歷史的記載詳盡而浩繁；許多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研究已有高度的發展。但是儘管有歐洲漢學家卓越的先鋒工作，直到最近數十年，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幾乎很難超越少數歷史經典之作的翻譯，和重要朝代及其制度的簡史。

最近，西方學者更充分利用了中國和日本豐富的史學研究成果，大大有助於我們對過去史實和制度詳盡的認識，以及對傳統史學有批判性的了解。此外，這一代研究中國史的西方史家，也能採用現代西方史學研究和最近社會科學發展的新技術、新觀點；繼續為發展迅速的歐洲、日本、和中國的中國研究樹立紮實的基礎。最近的歷史研究也發掘出新問題，而懷疑許多舊觀點。

在這種多重衝擊之下，西方的中國研究正有革命性的發展。

劍橋中國史的初次計劃在 1966 年，其目的在提供西方讀者有關中國歷史概括性的基本記述：以 6 卷的篇幅，依目前的了解，記述一般狀況。從那時候起，當代研究成果的大量湧入，新方法的應用，史學新領域的拓展，都進一步刺激了中國歷史的研究。這種成長，很明顯的可從劍橋中國史計劃出 14 卷看出來，這 14 卷尚不包括最早的上古史時期，並且尚須省略下諸如藝術史、文學史、經濟和科技方面的歷史，以及豐富的地方史。

近十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了解有驚人的進步：這種情形將會繼續下去。西方史家為使其人民對中國有更深更廣的了解，而努力專注於此龐大又複雜的主題。中國史是屬於世界的，不僅由於需要和理當如此，同時也因為它是一個引人入勝的主題。

**John K. Fairbank**

**Denis Twitchett**

**1966 年 6 月**

## 第十一册 序 言

通則化在所有對於歷史的思索中是必要的，而若用之於中國歷史，則變成特殊問題。「中國」在現代語彙中，事實上是一個很籠統的名詞。這個名詞代表衆多的人口，世界上最廣大的土地之一，擁有悠久的歷史——在時空上是無可匹敵的。只要將「中國」或「中國人」提升到一般的層次（以人口、年代或面積來衡量），則其他領域的歷史顯得微不足道。自從邁諾斯時代(Minoan Age)起，歐洲即是一個較小的單位。我們對歐洲的了解比較多，相形之下，對中國簡直一無所知；因此，如果認為歐洲史比較複雜，那顯然是過於武斷的看法。在近代以前，中國的記錄都比較浩繁，這也許是中國大一統觀念所產生的同類意識高於歐洲，或者是傳統中國史家的創意，特別關心社會秩序、國家及其統治階級。

無論如何，中國歷史的一般記載已有相當高的水準，現正研究尋求綜合與統一的觀念，以便給予時人一些中國過去的形象。這是迫切需要的，卻也困難重重：蓋爲了釐清是非功過，它一般情況下，或承認並悔悟罪行，或辨明並肯定思想學說，大眾需要一種常是和預設結論相符合的一般性形象。

這意味著研究中國史的史家必須比平常更小心的詳察細審，特別是由外來的旁觀者來撰寫中國史。例如，在西方的中國近代史絕大部份是中國與外國的關係史，這方面是外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容易的地方。當然，1840年（或1514年）以後，外力對



中國的多重影響是清晰可見的：甚至，一般已經習慣將外力入侵的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的起點。但是所有這些外來衝擊，只構成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環境的一小部分，其四周的情景和傳統生活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只是緩慢的在改變而已。難道外來衝擊在當時不會對19世紀中國的情景影響那麼大？這不是因為外來的影響會在大小或意義上縮減，而只是因為外來影響會被有關中國的新認識所遮掩。

這一系列的第十卷，不是從外國商業入侵和鴉片戰爭開始，而是照北京的觀點，從19世紀早期大清帝國和清屬中亞的制度結構開始。其後則是19世紀前半葉，清廷日增的行政管理、社會秩序等內政問題。內部不和的跡象和充滿活力的徵兆，同樣出現在對太平天國之亂、捻亂和飽受波折而成功的同治中興的解釋上。中國的經濟，甚至軍事制度，來自古老而絕非遲滯社會的原動力，面對史無前例的壓力，成千上萬的男女知道如何求生存。顯而易見地，18世紀末清代的軍事勝利和清屬中亞帝國的統治，事實上已為漢人從關內向廣闊的滿洲、蒙古、新疆、西藏東部邊界拓展奠下基礎——一次浩大的非宗教性移民，種因於18世紀即已開始的中國人口快速增加。

廣州雙向貿易的興起，是漢人唯一在數量、移民、貿易、甚至投資的擴展上，最著名的部分。部分中國人的拓展（多與歐洲的拓展同時），確實早已在海外開始。這種超越國界的海外移民，在中國沿海自成一個小傳統，在時間上，大約有大陸農業官僚帝國偉大傳統的一半那樣古老。從澳門、廣州到東南亞（南洋）的舢舨貿易所形成航海事業，長久以來即預期著歐洲殖民力量會到達該區。蒙古人接收了南宋海軍，於1292年蒙人遠征爪哇，明初

(1405~33) 又橫越印度洋遠征。由於1440年代蒙古勢力的復甦吸引了明朝的注意力，最後明朝又為另一個反對航海的朝代滿清所繼承，中國沿海的領導權因此而受阻。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卻日益仰賴中國商人及中間人經銷零售交易、執行特許專賣和收稅。華僑在這些歐洲殖民地裏，變成一種特殊的中產階級，正像他們也勢所必然的成為暹羅的統治者，其中有人確實建立了今日猶存於曼谷的卻克里王朝(Chakri Dynasty)。清廷雖然不重視航海，有時還加以譴責，但中國沿海的船員和企業家卻加入了近代早期的商業革命，遂在東南亞引起殖民運動。

這種國際貿易的快速成長，最後經由廣州、汕頭、澳門的商人，通過虎門（在廣州下游）所從事合法貿易及非法的鴉片貿易是促成日後國際接觸逐漸頻繁的主要推動力量。儘管外國商業記錄繁多，而目前中國資料不足，可以確知的是中國的對外貿易，是一種特殊的中外貿易，一旦口岸開放，外國公司的買辦會控制大多數的進出口貿易。無論外國居民認為他們的主權、條約權利及其船砲火力如何，香港、上海和其他的貿易地點已經變成中國人的城市。也可以說中國人加入了外國人開放中國的行列，正像外國人加入中國自身的商業開放一樣。約在1784年至1834年，東印度公司經營的大宗茶葉貿易，成長快速；而茶葉終究是來自中國的。遠在新疆或滿州的中國農人、貿易商和沿海中國的海員、企業家，表現出中國人民的活力，而且他們受到政府的協助很少。

若說對外貿易在中外人民的積極參與下是雙向的，則在評估外國對晚清歷史的影響也要考慮到另一點：19世紀期間，各民族

之間的接觸越來越頻繁。歐洲到新世界的大移民，遠早於19世紀中葉以後才向海外屬地移民的華僑。英國人民認為鴉片戰爭不像第一次阿富汗戰爭那樣具有戰略上的作用；而拳亂則只是艱苦長久的布爾戰爭（Boer War）期間，一次壯觀的意外而已。對大多數人民而言，工業化來自國外；在許多方面，變遷的重心也在國外。國際科技，一如國際貿易與政治，對全球社會生活的貢獻日多。從這觀點來看，自然會認為在晚清的歷史上，外來影響扮演了史無前例的重要角色。

中國進入世界社會，已為歷史解釋立下基礎，而這歷史解釋的本身就是外來影響所造成的結果。這些解釋結合了中國與其他各民族的經驗：第一是帝國主義，第二是現代化。經由類推法，希望在中國發現和世界各地相似的情況。

帝國主義和現代化幾乎是兩個超越歷史範圍的名詞，若要用之於歷史，則必須有確切的定義和具體的說明。一般而言，帝國主義含有外來的進取，而現代化則指國內的演進過程。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在中國並不施行殖民主義。外國人不發展殖民經濟的原因，只是為了外銷市場。甚至古典馬克斯主義者所認為的災難——機製棉織品的進口，也沒有摧毀中國土布手工製品。直到20世紀前半葉，由於機製棉線的廉價供應，使得失業的農家成員，即使不能完全供養家庭，也能利用這些廉價棉線，貼補家用。也許在1930年代，仍有百分之七十的中國棉布是手搖紡織品，這表示中國何等迫切的需要利用那些失業的勞力。手織顯示出他們的貧窮。就整體而論，反對機織布料的流行，也道出中國人民由於太過貧窮，而設法避免變成洋貨的大眾市場（香煙和照明用煤油燈例外）。這個例子說明了我們多麼需要了解有關晚清

內在情勢和外來帝國主義的關係。

帝國主義的心理衝擊，雖然是慢慢累積的，卻歷久不衰。隨著時間的推演，以帝國主義作為近代中國史的一個課題，在思想與心理層面更深切，它助長了民族主義，但是對經濟方面的影響，並不太大。中國人對外力剝削的觀念，已經有廣泛的認識，且見載於浩繁史料中，然而實際的外力剝削行為並不像剝削觀念所傳播的那麼多。各種記載的主要內容，是外人透過侵略以肯定其特權；在這個層次上，傳教士和商人互相競爭。帝國主義戰爭、船砲外交、條約權利、洋人出現，成為每個人所感受得到的事實，而且迄今記憶猶新。

以局外人的觀點來看，應用在中國的現代化觀念：主要來自近代西方所發展的包含一切的社會科學觀念。社會科學努力追求價值中立，有時仍會受到西方文化背景的限制。果真如此的話，這應該是一個暫時性的問題，會隨著世界文化的成長而消失。比較嚴肅的是在現代化一詞中，所含有的高層次的通則。我們認為它理解到所有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在進步發展上的觀念統一。現代所見到的普遍成長，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分析領域之中，帶來了複雜、變遷和發展。但是現代化過程在其中的每個領域，則由相關學科的名詞來界定。在各類的領域上，安置一個可行的原則，是表現了進一步的信念。這在邏輯上也許可以令人滿意，然而應用到混亂的史料則有困難。假如將形容詞的「現代的」提升到抽象的「現代化」地位，我們真的能了解嗎？這個名詞也許可能變成萬靈丹，就像「生命」載負著一大堆不可知的東西，不能釋明的訊息，無法解答的神秘。就像任何名詞，一旦將之具體化，就可能變成思想的代用品。

由於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著述日多，我們應該少要求涵括一切的通則，以避免為一新領域的學問預先設下架構。我們應當注意本冊許多部分對晚清時期的具體經驗描述和特意的關懷。哲學和政治思想史使我們能深入了解發生了什麼，以及如何發生；遺憾的是必須將文學和藝術摒除在我們的範圍之外。簡而言之，晚清對西方的回應，現在看來似乎只是次要的動機，主要過程仍在於中國在新的環境中（包括西方）不斷對中國的傳統加以調適。總之，刺激就在你所發現的地方，沒有反應的刺激，一點也不算是刺激。

例如，1820年代，由於接濟北京的大運河運輸系統沒落，使一批傳統經世學派的行政官員，試圖恢復山東附近的海運，以代替原來的漕運。只有到了1870年代用汽船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再者，自強運動的學理基礎：借用西方技術以保衛中國，可視為傳統經世觀念在新課題上的應用。1890年代，經過多次災難之後，進化的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偷偷進入儒家學說，作為革命運動的綱領。最後，改革份子的主要奮鬥目標，不是直接對抗帝國主義，而是對抗使帝國主義得到發展的中國傳統。清末，改革份子和革命份子都接受古代儒家的格言：「如果治家能井然有序，誰敢侮辱你？」中國的力量必須來自於中國的內部。對飽受傳統經典薰陶的讀書人而言，激勵中國未來的主要憑藉，仍在於中國的過去。對於研究晚清歷史家而言，這有助於了解中國偉大的傳統和19世紀。這也是我們認識孫逸仙以前一代的唯一方法。

萊特女士 (Mary Clabaugh Wright, 1917~70) 透過她的學生和朋友，以及她的二本分別討論1860年代與1900年代的

書（本卷最初和最後時期），使對中國晚清的歷史研究貢獻匪淺。「同治中興」(*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是她根據 1952 年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發展而成的著作，對於清廷的問題和政策有獨到詳盡的分析。「中國的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是她依據所召開並主持的學術會議論文（1965）編輯而成，收集了六國現代學者研究的成果，是第一本對這個主題作全面性探討的書。從 1945 年至 1959 年，萊特女士在史坦福大學籌劃成立「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中文圖書館，而從 1959 年直到她過世為止，她一直是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我們感謝她的先鋒工作，謹將本卷獻給萊特女士。

一九七七年十月  
**John K. Fairbank**  
劉 廣 京

## 譯 序

翻譯是一項極為困難的工作，也是常會出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是翻譯對於新知的介紹，不同觀念思想的溝通，有其難以言喻的貢獻。近年來國內翻譯之風逐漸興盛，坊間翻譯的學術著作亦日漸增多，但翻譯像劍橋中國史晚清篇的這樣巨大的學術著作，仍是甚為少見的。而我們之所以敢於作此種嚐試，實在因這部著作對我國近代史的研究太重要了。我們希望藉此書的翻譯，而能傳播若干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觀念與新成果，使國內對我國近代史的認識與研究方法略有改變。至少也可因此了解國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實況，以及與國內相異之處。

劍橋中國史晚清篇起自 1800 年，止於 1911 年，計為兩卷，即該書的第十與第十一冊，共一四六七頁，劃分成廿一章，均由知名專家學者執筆。所包括的史事範圍是整個清季，由嘉慶以迄於宣統，由政治、外交、軍事、社會、經濟，以至於邊疆問題。如何去翻譯這樣一部錯綜複雜包羅萬象的大書，特別是如能迅速地完成此一翻譯工作，以及如何尋覓一具有理想的出版社來支持此一工作，實在均不是容易的事。幸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教授憑其素有的組織與領導長才，一方面洽得南天書局，一力承擔財力支援與各項出版事務，該書局並於民七十二年十一月向劍橋大學取得中文翻譯的授權；一方面悉心規劃，採衆志成城的方法，集合臺大、師大、政大、文化各校歷史所系的年青菁英，從事翻譯，譯成後並儘其可能的請原作者或相關學者

專家予以校訂。由於校訂者不少散居世界各地，甚至居於國內的專家學者亦常事務繁忙，故校訂工作費時甚久。迄今歷時三年餘，終於大功告成，即將出版。我們雖不敢說，這項翻譯工作是做得相當完美，但實在是盡了心力。其中尤其是張玉法所長及南天書局，費力費神之處最多。沒有張先生的悉心籌劃以及南天書局的大力支持，根本無成書問世的可能。這是要在此特別說明與表示敬意的。

任何一本著作不敢說沒有錯或不妥當之處，尤其是翻譯作品。本書既是集衆力而成。其中錯誤或不妥之處，恐不在少。如蒙指正，極為感荷，並盼於再版時加以訂正。

**李 國 祁**

序 於 興 隆 路 蝸 居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夜



# 劍橋中國史

Denis Twitchett · John K. Fairbank 主編

第 十 一 冊

晚清篇 1800~1911 (下)